

S 1995年诺贝尔奖获得者
TUDIES
IN BUSINESS-CYCLE
THEORY

经济周期
理论研究

◎〔美〕小罗伯特·E.卢卡斯 / 著



◎ 商务印书馆

经济周期理论研究

〔美〕小罗伯特·E. 卢卡斯 著

朱善利 雷 鸣 等译

王异虹 温信祥

朱善利 校

商 务 印 书 馆

2000年·北京

致 谢

从某种意义上讲,我是在一个政治性的家庭里成长起来的:因为我们用许多时间在一起争论我们的社会如何运行以及它应该如何运行。当我长大以后,认识到不是每个人都是这样成长时,我已经积累了相当多的这方面的专门知识,以至于这种专门知识似乎最容易理解。为此我感激我的父母。

我的大部分专业生涯是在两个机构里度过的:芝加哥大学和卡内基—梅隆大学。要列举所有那些为我创造了令人兴奋和活跃环境的老师、同事和学生是不可能的。他们各人的影响明白地列在本选集的导言和各篇论文的谢词与引文中。当我受雇于工业管理研究院(我的大部分时间是在该院度过的)时,该院院长里查德·M. 西尔特老早就对我寄予希望,而他的帮助和鼓励使我对我的研究采取一种比大多数年轻学者所能够承受的更为长期的观点。殊不知,由于我们已经作为知己平等相处,所以阿伦·梅尔策不但是我人格和专业方面的楷模而且是我的好友和同事。这些致谢与各篇文章中的致谢有不同的特点,然而它们并非不重要,因此,我很高兴能有这样的机会来表达我的谢意。

国家科学基金不断地资助了我的工作。没有什么能够代替这种帮助,对此,我非常感谢。

只要看一下我的技术性较强的论文,就会对我的秘书的出色工作产生同情与感谢,这么多年来,我从秘书的帮助中得益非浅。

我感谢玛丽·乔·麦克卢尔和艾莉丝·蒙罗,她们做了大部分秘书工作,此外我还要感谢埃丽诺·巴罗西克,阿瑟娅·查巴拉,威海米娜·希利和蒙妮卡·马尔库斯。

导 论

这本著作收集了 1967 年到现在为止我所写的关于经济周期的论文,包括与伦纳德·拉平和爱德华·普雷斯科特合作写的文章。每篇论文写作都有其本身的原因,结果,这些文章的风格、方法、与内容都不一致。然而,这本论文集确实具有某种连贯性,这并非由于最初的计划,而是由于一系列实质性问题的稳定性,针对这些问题,与那种在我看来也许是有效地处理这些问题的方法的发展,导致了这种连贯性。这篇导论的目的旨在通过描述这些文章是如何完成以及通过简述每篇文章要尝试加以解决的这些科学性的和反诘性的问题而解释这种连贯性。

我和许多其他人关于经济周期的研究,由于人们在偶然接触了关于政策问题的理性预期学派时,认为这些研究对于国家经济政策具有新义而引起许多专业人员与公众的注意。我们这种学术式的术语非常适合有关社会政策的争论,如果它真的表明技术官僚的语言揭示了经济学能够仅仅通过对科学舆论的管理而影响政策,我将不拒绝这种说法。不过,在对有关于经济周期的研究进行讨论时,这不是一个好的术语。约翰·穆斯有关理性预期假设只是一个建立模型的技术原则,而不是一个与众不同的、综合性的宏观经济理论。运用了这一原则的最新探索已加强了米尔顿·弗里德曼和其他战后的货币主义者的政策建议,然而却没有提供多少有独创性的政策建议。我自己的研究几乎严格地限于试图发现关于

经济周期的一种有效的理论说明。

60年代的宏观经济学家并没有认为他们要努力去作“经济周期的说明”。用这种方式来看待他们研究的早期的经济学家就像凯恩斯革命的罗曼诺夫那样被认为是过时的。一般来说，我们认为这一问题正在解决。我们的研究主要是完善这种其主要的框架取得广泛同意的总体理论的各个部分或部门。70年代的探索迫使我和许多其他人逐渐进一步抛弃这一观点，而转向一种一般均衡观点，这种一般均衡观点我认为实际上与前凯恩斯理论家所持的观点基本相同，只不过在方法上不同而已。我在由经济周期而提出的科学问题性质上观点之变化，以及我自己随后从试图献身于凯恩斯宏观经济学到对他的经济学进行严厉批评，这种态度上的变化，在这些文章中也表现得十分明显。

这篇导论的其余部分只是一个按时间顺序编排的关于这些文章写作过程的交代。它不是知识分子自传，因为这一时期我还进行了一些其他方面的研究。它也不能代替或概括这些文章。我想，在为以前发表过的文章所写的新导论中，我自己不可避免地是为那些熟悉我的大部分研究的人而写作的。

我最初直接对经济周期进行探索，是一个与伦纳德·拉平的合作项目，合写的文章是“实际工资，就业与通货膨胀”，它是关于美国经济中总就业与工资的决定问题。当时我们的目的不是对流行的凯恩斯主义正统观念提出挑战，而是通过对宏观经济计量模型的工资—价格部分建立“宏观经济基础”对凯恩斯主义正统观念作贡献，这一点从那篇文章的引言与注释3那种保护性的努力中就可以看清楚。进行这种尝试时，我们的策略是在弗里德曼和莫迪利阿尼关于居民户消费决策研究、艾思纳与乔根森关于厂商投资

决策的研究、或弗里德曼与梅尔策关于货币需求的研究以后以一种模型化的方式使单个居民户的就业决策理性化。当然,我们意识到,关于就业周期行为的竞争均衡描述的研究在某些周期被认为是堂吉诃德式的或者甚至是起破坏作用的,但我们认识只是停留在这样一种深度,对这一被普遍接受观点的基础的描述不可能被设计出来。由于我们每个人用理论价格讨论经济周期就业行为时取得了课堂上的成功,因此,任务看起来并不都可怕,我们着手解决它。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我们面临的经验工作是通过 1929 到 1933 年就业的剧烈下降和二次大战间就业的迅速上升而使居民户与厂商的行为理性化的,并且用与精心确定的“长期”劳动供给的实际工资弹性相一致的方法去做这一工作。“理性化”对于我们来说符合关于经济机构理智的行为的见解。显然,这一点不能在我们用以说明的那种静态的、一期无差别图——例如:每周每个工人工时的长期下降——这样的水平上进行。(这是凯恩斯《通论》的第 2 章),反之,我们采用了一个两期的模型,在这个模型中,除现行价格外,预期未来价格也发挥作用。

从居民户的观点看,在这样一种理论结构中,在竞争条件下,作为就业变动的诱导因素是(除了我们没有认真考虑的自发的嗜好变化外),价格、工资和财富变化。除非闲暇被当作劣等品,否则,与许多长期截面资料相抵触,财富引起就业下降必然与幸福相联系而不是与沮丧相联系!对周期目的而言,这里留下了价格与工资的变化,或者更特别地,是这些变化时际的替代效应。本文的第 2 节不过是在十分精确地运用经济计量学的技术水平解释这一观察的含义。

对居民户根据其现行和未来工资与价格变化而改变工作时数的方式作这种程式化的描写,是本书所述问题的中心(确实,在某些方面,它后来变得在我看来比必然出现的结果更加复杂,因此进一步被程式化了)。这种描述留下许多重要的实质性问题没有解决,某些问题在随后的一些论文中进行论述,另一些问题看来仍然没有得到满意的解决(我将回到这两类问题)。然而,有一些实际理由表明,这种描述在我看来不是就业波动的最好的描述,而是唯一的描述;其对于我的主要吸引力首先是没有其他重要的描述来代替它。

单个人的市场供给的工作时数的时间形态在一种十分明确的意义上是他的某种选择。理解就业波动在某些方面必须包括理解这一选择是如何作出的,以及理解偏好特征与改变机会的什么样的组合产生了我们所观察的形态。在一些详细标准下,毫无疑问,社会习俗与制度结构影响这些形态,不过,社会习俗与制度并不是简单地和突然、任意地强加于单个经济机构。相反,制度与习俗被精心加以设计以便有助于使偏好与机会发生令人满意的匹配。从理论上考虑,如果可以做到这一点,我们在实际劳动与产品市场上所观察到的复杂布局就不会构造出一个对我和拉平所使用的模型来说是替换模型的步骤,而是向扩展或精确化方向迈进的一个步骤。对于这样一种扩展来说,为了说明就业波动,除了它成功地说明了的其他制度特征外,它还要说明在给定人们机会的条件下,为什么人们喜欢包括无规律的就业形态在内的布局。忽视这一简单的特征在我看来是糟糕的社会科学:一种企图说明人类行为的重要方面(而又既不涉及人们喜欢什么)又不涉及他们能够做些什么的社会科学。

而且,通常我看没有什么办法说明所观察到的不依赖于对劳动的时际替代性认识的就业形态。这一文献包括无数可能是额外

的、补充条件的例子,但就我所知没有其他可供选择的方案。

当然,除了我和拉平选择的模型外,在一种显模型里还存在其他的包括时际替代性的方法。某些方法能够并且已经在竞争性的结构中被考察过了。我们的兴趣在于用公式表示这些模型时包括所考虑的各种行为的广度:相对于“闲暇”而言的工作;工作、闲暇与寻找工作;入学、睡觉、吃饭等等。显然,对于这样一种行为分类不存在自然的限制,不同的分类对于不同的目的是有用的。在选择一种两行为分类时,我们考虑我们主要的决定是是否力图把测度的失业在理论上解释为一种行为。由于这篇论文所给出的原因,我们决定不这样做,但为了其他目的与数据建立,试用其他两行为分类(例如:工作/求职)或多行为公式是有益的。就这一点而言,存在着大量文献,这些文献源自麦考尔和莫滕森,它利用了许多可能性。然而我要指出的是,拉平关于劳动供给对于现行和预期工资与价格变动反应的特定形式和我的劳动供给对现行工资与价格变动反应的公式不是最重要的、最好的,或者说唯一的公式,而是这些不同公式的主要结构是相同的,而且全部都依赖于劳动的时际替代。

在任何公式中,时际替代包括由于对实际利率或实际报酬率的大小的因素而作出反应时所提供的现行工作时数。一种预期的价格通货膨胀影响我们模型中的行为,因为它降低了为了明天消费而在今天提供的劳动的报酬。如果今天的劳动通过持有生息债券而转变为明天的消费,如果预期的通货膨胀导致有关这些债券的名义利率一对一的提高,那么对于现行工作时数决策有关的实际报酬率无论如何都将不会受到通货膨胀预期的影响。拉平和我通过作为一种可能性承认这一困难而回避了它,而特别提到利率

看来不是按这一方式调整的,其原因我们未作解释。我想这一点是正确的决定,因为在我们所探讨的局部均衡的范围内没有希望解决这一问题。然而这一问题在其他地方继续被提出并且大体上依然未被解决。的确,当任何宏观经济学家运用卢卡斯(实际上,当然是卢卡斯—拉平)供给函数时,他也是在回避这一问题(以及为此举而负的责任!)

我们论文中其他没有解决的主要问题是预期形成的处理,不过这一问题从那以后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进展。米尔顿·弗里德曼(1968年)在美国经济学会发表主席演说的时候,我们正在写论文,由于他的推理似乎是结论性的,并与我们模型的预期相矛盾(就像它与所有菲利普斯曲线模型的预期相矛盾一样),我们的研究中断了。我们最后三句话用一种没有解决问题的方式对付了这一难题,这种方式设计得非常巧妙,以致后来并不需撤回或为此而道歉。

“大萧条时期的失业”包括在这本文集中是因为它包括了对最初论文的一个重要订正,而且它对30年代劳动市场行为的哪些方面可以用现有理论说明,哪些不能用现有理论说明都作了总结。这篇文章是回答艾伯特·里斯的评论,但对于裁决这一争论感兴趣的读者显然也要注意里斯的观点。

拉平和我的文章中最好的东西是埃德蒙·费尔普斯发现的,当费尔普斯研究同样的问题时,其他人一系列有关的文章也研究了这一问题。这些研究书籍中以费尔普斯的著作(1970年)最为众人所知,为了庆祝与出版商签订合同,他在菲拉德尔菲亚举行了讨论会。幸运的是,由于随后的发展(如果不是由于我们讨论的连贯性),费尔普斯为此次讨论会确定了一条基本规则:任何作者都不

得讨论自己的文章，只能讨论由费尔普斯以会议议程形式提出的某些基本问题，这些文章中没有一篇对这类问题提供了令人满意的答案。

拉平和我至少是以更侧重经济计量的宏观经济传统中典型的部门方法进行思考。我们认为我们自己构造了一个“工资—价格部门”模型，这种模型和提供整个经济模型的其他“部门”提供的模型相结合可能是合适的。参加讨论会的大多数人用同样的术语来看待自己的研究（阿曼·阿尔契安没有参加会议）。从他的那本著作的导言中可以很清楚地看出，费尔普斯是用一般均衡的方法考虑问题，并利用他安排讨论的机会把我们的讨论限制在这一方面。如果某个经济机构受到欺骗而设想相对价格将按照对他有利的方式变动，他的行为不会由于其他人相反的误解而被抵销吗？（这不是从费尔普斯的问题表上直接引用的，原话我早就忘了）。为什么把价格预期表示为在价格水平上的适应预期（像拉平和我所做的那样）？与劳动市场决策有关的价格预期为什么不同于与债券市场决策有关的价格预期？总之，对仅仅以通过信息的不完全性而导致大规模就业波动的，相互一致的方式运行的完整经济的描述是可能的吗？很清楚，那本著作中没有一篇文章在探讨这一问题时曾获得成功，尽管大多数人预先假定这样做是可能的。

费尔普斯导言性的论文以一种不太正式然而却是具体的方法处理了这一一般均衡问题。那次讨论会上我们的许多讨论包括在按现代数学形式提出这一论点方面看来是成立的问题内。

“预期与货币中性”试图去做这一工作。这篇论文与费尔普斯文章的联系变得比我开始写作该文章时所预见的还要强。最初的思想仅仅是要把某些卢卡斯—拉平意义上的居民户置于一种货币

经济中,让体系受货币供给随机波动的限制,并看看将会发生些什么。萨缪尔森的代际货币经济提供了一种方便的分析结构,因为它既适应拉平和我研究过的两时期消费者最大化问题,又适合于对其进行明确定义的“货币”函数。把均衡定义为一些“状态变量”函数空间上的一个点的思想是普雷斯科特与我在“不确定性下的投资”一文中所运用的思想。这一分析方法曾迫使我与普雷斯科特准确理解像信息与预期这样一些词的意义,并且导致我们用恰好是我后来在“预期与货币中性”一文中所使用过的方法去阐述与运用穆斯的“理性预期假设”。总之,一般均衡公式所需要的成份看来唾手可得。

我所尝试的最初的公式包括一部门体系,并且把货币波动作为不确定性的唯一原因。通过由比例性的转换而注入新货币,我认识到(很麻烦,使我感到惊奇)货币波动,不管是预期的还是非预期的,恰恰像中性货币变动那样起作用,对于这样一种中性货币变动来说,经济机构能够彻底纠正。要改变该模型以便通过例如一种通货膨胀税或通过转让给工作的年轻一代而引进非货币中性是相当容易的。不过,这样一种波动的实际效应也许不是产生于在拉平与我的理论结构中起作用的替代效应,而是产生于在前一节经验基础上被排除的收入与财富效应。

到此为止,对我来说已经很清楚,为什么费尔普斯想象了一个岛屿式的经济,该经济中的交易者对于有用的、体系范围内的信息是分散的和缺乏的。正是这一特征才允许所有生产者同时相信相对于其他人来说他们从货币波动的后果中得到了好处。把这一“岛屿式”的特征结合到一般均衡体系中去变得比我所预想的更难以分析。另一方面,在这一完成的模型的运行与弗里德曼、费尔普斯、

拉平与我以及其他人的推测之间的“拟合”变得相当完美。

这一“拟合”作为一种对比而产生。说实在的,我已经被弗里德曼与费尔普斯关于自然率假设是有效的并与所观察的经济周期相一致的论点所说服,不过这一说服的形式是确信可以构造一种人为的模型社会,在这个模型社会中,这些假设被推测是有效的。如果这种构造是不可能的,那么我只是试图用一种错误的方式得到这一构造的可能性就会留下最引人注意的结论,但说服的程度将被减弱。通常,我相信一个自称懂得飞行原理的人可以合乎情理地指望他能够制造出一种飞行器,懂得经济周期的人在大约同样的意义上意味着他有构造经济周期模型的能力。现在我认为费尔普斯的著作脱离了这一基础。

尽管(或者也许是因为)有着高度抽象的特征,“预期与货币中性”一文从三个不同的方面影响着我的探索。首先,很清楚,拉平和我的供给理论可以很容易地与 IS-LM 形式的总需求理论相结合的最初观点并不像计划得那样行得通。尽管有关居民户行为的理论在这两篇论文中保持不变,但从适应预期到理性预期的变化意味着,单一部门的行为如果不涉及与本体系统其余部分的部门间的相互作用就不再能够加以设计。

其次,一种在某种意义上讲体现了所谓经济周期的、明确的模型经济的构造,使得弄清楚我们用过去认识我们知之甚少的现实经济实际情况的经济计量方法是否会给我们关于我们什么都了解的模型经济以正确的答案这一问题成为可能。这里,答案是否定的(这是“预期与货币中性”一文的第 4 节)。这一见解本身没有提出多少有关实际经济周期的问题,但它提出了关于经济计量方法的某些尖锐问题,这些问题会以一种大部分是独立于它们最初所赖

以产生的抽象内容的方式而被提出和加以研究。

第三,“预期与货币中性”模型明显的新颖性连同我自己的经济思想中许多原始的观点被确凿证明是错误的这一不愉快经历一起引起了我对大量有关经济周期的前凯恩斯主义文献的兴趣。在那里,我发现的不是对凯恩斯所描述的,被作为“历史”而被两代或三代凯恩斯主义者所重复的明显事实的顽固抵抗,而是一些非常复杂的文献,这些文献从当代理论技术来讲是无助的,它们强调经济周期复发性特征,强调把这些复发性视为是错误的必要性,并试图将这些错误合理地解释为其对于“名义”信号波动的明智的反应,而构成名义信号基础的是我们所关心的、并想作出反应的“实际”事件。如果韦斯利·米切尔 1931 年可以把经济机构看作是“信号的处理者”,那么我看没有理由把我自己 1972 年采纳这种观点看成是不适当的推测。

这三个方向中的每一个方向在本书的其余文章中是显而易见的。每篇文章都显得比“预期与货币中性”一文中高难技术假定的形式更有说服力。当然,人们全然不会对下列事实感到惊奇与不满:要使人们相信某件事,你就得以谈论他们所关心的问题的方式以及用他们认为是情投意合的语言来提出问题。然而,断言这些抽象的“玩具模型”是可以免除的步骤,或者断言人们不借助于这些模型的帮助就可以直接得到有用的、简单的线性模型的公式,或以新的认识去理解米切尔的观点都是错误的。至少对我来说,正是产生于这些高度抽象然而是十分明显的模型的工作,才是构造新经济计量模型、批判旧模型或者从一种新的观点理解古典著作的源泉。

如果“预期和货币中性”是阐述弗里德曼—费尔普斯自然率假

设的正确方法,那么显然,用于检验这一假设的经济计量方法就完全不得要领。此外,尽管通货膨胀率与失业率之间负的样本相关可以被定义为一种“交替”,但很清楚,也许没有办法把改进福利的社会政策建立在这一相关的基础上。那篇文章被最初所提交的杂志退稿,这件事使我深切地认识到,我期待的该文读者的数量是有限的。因此,我很高兴应邀在两次讨论会上宣读论文,每次讨论会都提供了足够宽松的条件允许我阐述我的观点。

“自然率假设的经济计量检验”是为了评价大规模经济计量模型的工资—价格部门的讨论会而准备的,应这次会议之邀,我对偏离弗里德曼—费尔普斯的观点进行发言。该文的目的是用尽可能小的技术复杂性说明为什么弗里德曼—费尔普斯假设的标准滞后分布检验不能解决问题,并用普通的方法表示一种人们可以从中学会某种东西的检验。(第一个目的已由托马斯·萨金特(1971年)实现,尽管当时我不了解这一点。萨金特随后通过运用将名义利率与预期通货膨胀率相联系的费雪方程式的理性预期假设实现了第二个目的,这篇文章大约完成于同一时间。)

“经济计量政策评价:一种批评”一文是为卡尔·布伦纳和阿尔伦·梅尔策的卡内基—罗切斯特系列讨论会的首次会议而准备的。这项任务鼓励我写作更广泛、更一般的论题,而若由我自己设计而写作议题,就不会有这么广泛而又一般;这一值得花费精力的系列讨论从那以后也多次对年轻学者提供了同样的刺激。这篇文章也反映了爱德华·普雷斯科特的影响,普雷斯科特最近已从宾夕法尼亚大学转往卡内基—梅隆大学,他在许多大规模经济计量模型设定的技艺方面启发了我。

在沿着劳伦斯·克莱因的研究工作前进时,我被下列情况所

触动：当克莱因模型短期的预测能力稳定地得到改进时，克莱因自己却显然越来越对经济理论与经济计量理论不感兴趣。我想起了（但想不起是在什么地方）克莱因的描述：在他的描述中，同样的价格方程是从一个完全竞争模型、一个纯粹垄断模型和一个行为的加价定价模型导出的！要点是清楚的：选择适合你口味的“故事”，但不要上当，以为这一选择会起作用。我与其他人所从事的关于滞后分布投资函数的最优基础的理论研究一直把我引到同样的境地；尽管我们的“故事”变得越来越好，但是这一“进步”看来在经济计量投资函数的完成方面没有任何改进。

在这一行中，理论工作的信誉是那样可靠，以致这一理论工作的辩护者就像特定作为经验工作的毁灭性批判一样，很少发现自己处于守势，很少发现自己制造了无意义的称号。这种倾向的代价不是经济计量工作不能被解决——某些人得做这项工作——而是理论工作者和实际经济计量工作者之间的交往变得令人不愉快，结果是他们固执己见，理论和实际之间必要结合没有发生。不过我想，对克莱因的价格方程和由相对非理论模型预测成功所提出的一般挑战要慎重对待；因为，如果人们期待经济学家回答的实际问题可以不借助于经济理论就能回答，为什么我们还需要理论？

“预期与货币中性”一文所采取的一般均衡方法对这个问题提出了明确回答。在模型经济中，显然，控制货币政策的规则的变化改变从经济计量意义上来说人们通常认为是价格方程的系数，而不管过去样本期这些系数的稳定性。一旦了解了这一点的原因，就不难明白同样的参数不稳定性必然在实际经济中产生。“经济计量政策评价”一文仅仅是以我能够设想的许多不同联系清楚地说明这些原因。使我欣慰的是，评价政策时理论的重要作用这一实例同

用相对而言是非理论的经济计量模型进行的成功的事前短期预测的可能性完全一致,因为这一成功的简单否认(而且在某些循环证明中仍然这样做)当时越来越站不住脚。

我把“经济计量政策评价”看作是对理论与经济计量工作之间关系这一重要问题的一项贡献,但人们有时认为它好像比可能的情况更明确地解决了这一问题。那篇文章强调了识别结构性参数的重要性,这些结构性参数在人们有兴趣评价的那种政策变化的情况下是不变的;在那篇文章中的所有例子中,只有描述“嗜好”与“技术”的参数具有这一性质。这一推断对我来说是合理的,但在经验的基础上而不是在逻辑的基础上为它辩护,而且这种辩护的性质可能会随着人们心目中的特定运用而变化。效用理论并没有告诉我们,在价格行为变化的情况下效用函数不变;其运用假定了这点。比如说,经验的恩格尔曲线在大量情况下的稳定性反映恩格尔的判断是恰当的,并且该曲线对我们来说是令人惊异的好运气,但作为经验的科学家恩格尔本身没有办法在逻辑上保证情况会如此。

尽管对标准的、滞后分布的自然率假设的检验好像完全受到怀疑,但看来,认为没有办法将两种假设从经验上区分为像稳定的菲利普斯权衡与自然失业率一样在含义上是不同的两种假设是不可思议的。如果在滞后分布的菲利普斯曲线中的系数与该问题无关,某些其他检验必定有关。1970年,我沿用在利用了美国时间序列的“自然率假设的经济计量检验”一文中作为描述性运用的方法对模型进行了试验,但在寻找其中包含着自然率假设的持久的“可维持”假设方面没有获得成功。伦纳德·拉平有时认为跨国间的比较可能是有用的,特别是把高通货膨胀率的拉丁美洲国家包括在